

# 陕西家蚕品种志

罗玉功 主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

# 陕西家蚕品种志

罗玉功 主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

编写单位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蚕桑丝绸

研究所

主 编 罗玉功

编写人员 罗玉功 刘重盈

古巧珍 白克明

## 序

陕西过去是我国蚕业发祥地，当今则是我国蚕业西迁北移的理想落脚地，陕西蚕业必然会发扬光大。

陕西的家蚕育种工作从一九五二年引进华九×瀛翰等一批新品种推广以来，就逐步走上了引、配、育三结合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步步地走进了全国先进行列。曾和象一起在陕西家蚕育种工作中奋斗了二十多年的罗玉功等诸位同志，他（她）们有理想有目标，努力工作，钻研刻苦成就卓著，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深感家蚕育种工作者，如果掌握了一批种质资源，特别是有价值有特色的种质资源，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可能跟上潮流，有所创新，于是他（她）们结合工作，整理心得，总结经验，收集资料，对陕西的家蚕品种资源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着了这本《陕西家蚕品种志》，这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用性很强很有价值的书，也是家蚕育种工作者必备的书，我祝这本书的出版，象预祝在作者们的努力下，在这个书的促进下，不久将会有一批更新更好的实用品种、基础品种、特用品种问世，将会对陕西蚕业、北方蚕业，乃至中国蚕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象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承经宇于一九九五年五月



# 前 言

种质资源,又称品种资源或遗传育种材料,是发展遗传育种、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的物质基础,在未来的生物工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时代,品种改良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种质资源的占有量、研究深度及利用率。在近期,农业科研领域都把种质资源的研究,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农业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陕西省蚕桑生产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生产实践、科学研究和科技交流中,众多的家蚕品种被育成、引进和推广应用,使我省的蚕品种日益增多,基因库不断丰富。特别是育成了一批能够适应我国北方蚕区饲养的陕蚕系列实用品种、高茧层率基础品种、高出丝率基础品种和含有野蚕血统的基础材料,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省乃至全国的家蚕种质资源和基因库。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实用品种的增产潜力,充分利用现有种质资源中所蕴藏的优秀性状,加速品种改良速度,陕西省蚕桑丝绸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十分重视家蚕种质资源的搜集、挖掘和整理,为研究本省家蚕品种资源,曾多次从国内蚕业生产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引进了一批生产用品种和种质资源。经全面调查研究,现查明包括我省曾经应用过,且保育过一个时期在内的品种共 213 份,包括这些蚕品种(原种)的形态特征(含卵、幼虫、蛾、蛹、茧),生理性状(含化性、眠性、生活习性、抗性),数量性状(含卵质、卵量、生命率、茧质、茧量、丝质、丝量等)。从而为家蚕遗传育种、品种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品种鉴定等提供了有关资料。

《陕西家蚕品种志》就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选择与本省蚕

桑生产和品种改良有关的 172 份品种(原种)汇编成册并出版发行。为了对本省蚕桑生产和家蚕品种的变迁有一个较系统的了解,全书由陕西蚕桑生产史与蚕品种的变迁、陕西蚕品种的概况、各年代的推广蚕品种、地方蚕品种、陕西育成的蚕品种、基础蚕品种、特性蚕品种、引进蚕品种、家蚕品种的性状调查共九章组成,是记载陕西省家蚕品种资源的第一部专著。它的问世,将在陕西的蚕桑生产、科研、教学,家蚕品种的改良和鉴定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公诸于世的 172 份家蚕品种资源,是几辈科技人员 40 多年艰辛努力的成果。在本书出版之际,编著者衷心地感谢陕西家蚕品种资源搜集、研究奠基者姚沃教授和承经宇研究员,感谢早期为该项研究投入大量精力的陈震彩、陈筠、尤丽华、冯文福、韩元中、马吉星、梁志贞等同志,以及现阶段从事这一研究的刘重盈、古巧珍、宋新华等同志。同时感谢为编著本书提供品种、资料、指导和帮助的有关单位及专家,并对悉心审阅的承经宇研究员致以谢意。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蚕桑丝绸研究所

1999 年 8 月于周至

# 编写说明

一、本书共编入品种 172 份,其中包括各年代的推广蚕种 64 份,地方蚕品种 9 份,陕西育成蚕品种 45 份,基础蚕品种 5 份,特性蚕品种 14 份,引进蚕品种 35 份。按顺序编号,每品种序号从 1 到 172。

二、推广品种是指 1952~1999 年在我省先后推广应用的品种(包括本省育成品种、外省引进的品种)以及外省推广应用的我省育成的蚕品种,按推广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对交品种排列在一起,中国系统在前,日本系统在后。

三、育成蚕品种是指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蚕桑丝绸研究所育成的未推广应用于生产的品种。地方蚕品种是指原产于本省的现保育下来的少数品种,按一化性、二化性、三眠、四眠品种顺序排列。

四、基础蚕品种是指其某一经济性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可以作为育种素材的品种。特殊性状蚕品种是指具有某种特殊性状和一定研究、利用价值的品种,按其斑纹、抗性和其它特性顺序排列。

五、引进蚕品种是指从外国、外省引进后虽未被推广应用,但仍在本省科研单位保育的品种。按中国系统、日本系统、欧洲系统顺序编排,同一系统的品种按每一品种第一个字母的笔划数顺序编排。

六、“家蚕品种的性状调查”一章是蚕品种资源研究中必须掌握的重要技术环节,编者参考了《浙江蚕品种志》和本省在研究品种资源过程中的一些主要操作技术编写而成,供从事该项工作者参考。

七、为查询品种方便起见,书末列有品种名录页码索引,按汉字笔划数排列,阿拉伯字数按汉字笔数计,即 1 为 1 笔,2、7 为 2 笔,3、9 为 3 笔,5、6、8 为 4 笔。品种序号与正文一致。

# 目 录

序

前言

编写说明

<b>第一章 陕西蚕桑生产史与蚕品种的变迁</b> .....	(1)
一、陕西蚕桑生产史 .....	(1)
二、陕西蚕品种的变迁 .....	(9)
<b>第二章 陕西家蚕品种的概况</b> .....	(17)
一、地方家蚕品种的研究和利用 .....	(17)
二、家蚕杂交种的推广应用 .....	(19)
三、建国以来家蚕品种的选育、鉴定与推广 .....	(20)
<b>第三章 各年代的推广蚕品种</b> .....	(30)
一、50年代(1952~1959) .....	(30)
二、60年代(1960~1969) .....	(34)
三、70年代(1970~1979) .....	(43)
四、80年代(1980~1989) .....	(56)
五、90年代(1990~1999) .....	(84)
<b>第四章 地方蚕品种</b> .....	(105)
一、一化性三眠蚕品种 .....	(105)
二、一化性四眠蚕品种 .....	(107)
<b>第五章 陕西育成蚕品种</b> .....	(111)
一、中国系统蚕品种 .....	(111)
二、日本系统蚕品种 .....	(130)

<b>第六章 基础蚕品种</b> .....	(149)
<b>第七章 特性蚕品种</b> .....	(154)
一、斑纹限性蚕品种 .....	(154)
二、其他特性蚕品种 .....	(162)
<b>第八章 引进蚕品种</b> .....	(168)
一、中国系统蚕品种 .....	(168)
二、日本系统蚕品种 .....	(175)
三、欧洲系统蚕品种 .....	(185)
<b>第九章 家蚕品种的性状调查</b> .....	(195)
一、生物学性状调查 .....	(195)
二、发育调查 .....	(197)
三、生命力调查 .....	(198)
四、产茧量和茧质调查 .....	(201)
五、茧丝调查 .....	(203)
六、抗性调查 .....	(209)
七、对人工饲料的适应性调查 .....	(215)
<b>附录 家蚕品种名录索引</b> .....	(216)
<b>参考文献</b> .....	(225)

# 第一章 陕西蚕桑生产史与蚕品种的变迁

## 一、陕西蚕桑生产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命元妃嫫祖“为室养蚕”，“煮茧绎丝”<sup>(1)</sup>。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掘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6000年前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时代原始人集居、生活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出土的陶器残片上就有“纹痕细如丝”的线纹、桔状石纺轮以及2~4cm长的骨针等物。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知采集、利用野蚕茧的技能。这些史料说明，在无文字记载以前，黄河、长江两流域就已经开始了蚕业生产活动。<sup>(5)</sup>

西安半坡村地处陕西八百里秦川腹地，是黄河流域中游最得天时地利的一块宝地，是周代祖先的发迹地。西周初期，关中民间已有栽桑养蚕的活动。《诗经》中多处描述农耕蚕织的诗句。秦始皇陵中，有30多箱“金蚕”陪葬墓地。考古出土文物中，在岐山、扶风交界处的何家村，发现3000年以前已有“玉蚕”和丝绸染织物。<sup>(1)</sup>1986年在石泉县前池乡谭家湾出土的一枚“鎏金蚕”，维妙维肖地刻画出熟蚕扬头吐丝的神态，系前汉文物（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东周末期，诸侯相互争斗，关中蚕桑破坏殆尽。西汉初期，“文帝躬耕，景后亲蚕，励精图治，一意农桑”，于是“耕桑者益多”。汉世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到处桑林密布，在上林苑设置蚕馆，专司蚕桑业。在西汉时期还设有蚕官令丞。京都长安皇宫中有东、西织室，每年耗资5000巨万，以关中的丝茧为皇室织造高级缙帛。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毅力坚韧的陕西城固人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长达9700公里，贯通西北，直达

西亚的“丝绸之路”，传播了东西方的文化和农业技术。他的卓著功勋，当时被汉王朝封为“博望侯”。这是我国蚕业史和陕西蚕桑生产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光辉的一页。汉成帝时，议郎汜胜之在关中督劝农桑，并创造无性繁殖的桑苗插条法和“上蚕法”，整个秦川地带成为蚕桑盛地，蚕桑生产达到兴盛时期。<sup>〔1〕</sup>三国时，安康月河川道地区的蚕麻生产已闻名遐迩，孟达在与诸葛亮书中就盛赞月河川道“黄壤土沃衍，而桑麻列植”。<sup>〔19〕</sup>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安先后有 11 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唐代，京都长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蚕丝织品的集散地，云集京都的外商学士有 10 万多人。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把大量的丝、绸、绫、绢、帛等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等地。丝路沟通了欧亚文化，促进了历史上蚕业的发展。陕西至今还有不少以“桑”命名的乡村，如兴平县的桑镇，凤翔县的小桑园，周至县的桑园堡，麟游县的桑崖和桑树塬，韩城县的桑树坪，子长县的桑台，宁强县的桑湾，宝鸡县的桑树滩，耀县的稠桑，铜川市的桑皮头，安康市的桑园铺、贡桑铺、桑溪铺，石泉县的丝民坝，以及华县的丝巷，眉县的丝街等都是在发展蚕桑中形成的。

到了宋代(960~1279)，长安的气候冬季更冷，兼之宋初棉花传入陕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革，蚕桑生产南移，对黄河上中游的蚕丝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宋时陕南仍有蚕桑生产，苏轼在赞叹南郑一座名叫南园的风景区时说：这里“不种夭桃与杨柳，所种的都是许多桑树”。苏辙在一首以《野人庐》命题的诗中说道：“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陆游的诗更加具体地描绘出汉中桑树遍野的景象，他歌咏道：“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sup>〔9〕</sup>。元代重兵革，轻农桑。明清两代复将“耕农树艺，养蚕织绸”视为“王政之本”。明洪武二年(1369)石泉县令谭衍“劝课农桑”。明成化十三年(1455)兴安(今安康)知州郑福以“省沃土，深民树桑棉艺菽粟”，因有政绩深得绅民赞颂。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视兴桑养蚕为“富民之道，立国之本”。<sup>[2]</sup>这一时期，陕西省的蚕桑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康熙二十五年(1686)，汉中知府滕天授“重农桑、以足衣食”，传受蚕桑技艺，而且“恐民间终未能认真与种地一般”对待此事，又专门撰写了《劝民栽桑示并歌》，以便民告示印发各属乡村，务求家喻户晓。为使百姓听懂易记，又把告示内容编成一首24句336字的长歌附于文后，教民栽桑养蚕，使“农夫事固不可缓，而栽桑亦万不容缓者也”。而且制定了奖励政策：“民有桑树百株者，州县以勤民注册优待；栽二百株者，花红乐鼓迎送；三四百株者，州县给以牌匾；五百株者，州县据实申报，本府亲给牌匾，鼓乐花红奖赏”。在滕天授的耐心劝导和州县协力齐抓之下，汉中府的蚕桑事业得到恢复。在雍正年间《陕西通志》中载“四境多桑，蠖（音象，即蚕）极丰”，从乾隆至光绪末年，汉中蚕桑业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鼎盛时期。1946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印的《汉中盆地考究报告》称：汉中蚕桑业清季最盛，又以城固、洋县桑树最多，制绢家数达50余，畅销远达甘肃、青海、新疆，洋县“马畅绢”久负盛名。<sup>[23]</sup>乾隆年间，出生在秦岭之北、渭水之阳的兴平桑镇的杨岫（音申）（1687~1785），<sup>[25]</sup>以教书为生，博学好问，致力于钻研自然知识，在家乡大力倡导农桑事业，并亲身实践，深究栽桑养蚕技术，积13年之经验，在乾隆五年（1740）著成《鬮风广义》和（1756）《蚕政摘要》两部农业技术专著。乾隆六年（1741），杨氏将其著作和所缫水丝、织绢帛，一并呈验陕西当局，呼吁重振关中蚕业，引起陕西巡抚陈宏谋赏识，将其“招之来省，设立蚕馆，发给工本，养蚕织缣”。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陈宏谋在给朝廷奏疏中称：“陕省幽岐、芄地，蚕桑之事，自昔之盛，日久渐替。查西同、凤汉、邠乾等州府，皆可养蚕。今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树，雇人养蚕。并于省城置机、觅匠、织缣，此次进呈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务桑者更多，计通省增桑树已及数十万株。从此渐加推广，陕西省桑之利，可以复兴”。杨岫的努力与陈宏谋的倡

导,对恢复关中的蚕桑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sup>[2]</sup>嘉庆十三年(1805),兴安知府叶世倬将杨岫的蚕书择其精华纂编为《蚕桑须知》刊印发行,并为之序说:“古人蚕桑之教起于西北,今则其利尽归东南。秦人知农不知桑,一遇旱潦则饥馑随之。不知蚕桑之利倍于农,而其功且半于农。毋乃先代之失传,亦乃有司劝课之未详欲?”叶氏又颁发《示兴郡绅民急宜桑树养蚕谕》,据理纠正兴郡不宜树桑养蚕之说。并督促绅民“春令届,所有养蚕器具,急宜遵照前颁书图式购办。并预购蚕种,以备应用,切勿狐疑自误,有负本府领欲遵圣论,谆谆为谋小民衣食本意。”并作诗谕赋,劝民业蚕。诗曰:“豳风耕织旧曾谙,何事秦农不业蚕?桑柘山山隋处有,休教美利属东南。”汉阴厅通判钱鹤年遵照府示,积极劝民兴桑养蚕,他发现当地乡民养蚕、取丝、织绸、作帛不得法,“成茧松而不实,取丝粗而色暗,丝绢亦不均洁,作帛不能润厚”,便从浙东带来蚕种,并延善于养蚕者来汉,教民兴桑、养蚕、取丝、织绸、作帛之法。嘉庆十六年(1808),钱氏在其《广植桑树谕》中说:饲蚕至三眠时,叶上微撒石灰,则成茧紧密沉实,煮茧需用河水,釜中之茧不宜多煮亦不宜久煮,每丝一根下茧数枚,取丝细亮,织绢光匀,作帛润厚。道光十五至二十四年(1835~1843),浙东孝廉陈仅任紫阳、安康知县时,勤政惜民,极重农桑。“刊《艺茹集》,劝民种植备荒,发《蚕桑示》,教民树桑养蚕”。陈氏为《紫阳县志》作序说:“余之于紫阳也,劝种枸,劝种桑,劝种苕丝以为备积,至再至三”,因政绩卓著去任时“民庶道留”并树《邑侯陈公去思碑》以资怀念。道光二十九年(1848),《石泉县志·人物志》记载:“饶丰人刘永泰之妻夏氏,其子文秀,邑庠生堂,令读《蚕桑须知》书,聚妇女而听之。故其家事蚕桑,春饲夏缲,秋冬络纬而织,继之以夜”。光绪二十二年(1896),兴安知府童兆蓉主持制订《蚕桑简要章程》,细述树桑、养蚕、缲丝之法。清末安康、汉阴、石泉、川道丘陵地区兴桑养蚕均有大的发展。<sup>[2]</sup>光绪三十四年(1908)岚皋县漳河坪人陈可庄,东渡

日本东亚蚕业学校学习,回国后,于1916年(民国5年)在岚皋县创办蚕桑公社,兴桑养蚕,开办实业,也曾在安康乙种蚕业学堂任教,后从医,建国后曾任本省政协文史馆员。<sup>[1]</sup>宣统二年(1910)安康知县林杨光创办乙种蚕业学堂,开设有桑园、蚕室、图书、仪器供学生实习。1913(民国2年)紫阳县知事刘式金主持创办乙种蚕校,并资助该县汉王城人王雨漠赴日留学蚕桑。<sup>[2]</sup>姚沃教授于1912~1918年和1924~1925年两次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和研究蚕桑,回国后在贵州农校任蚕科主任,河北农学院、北平大学任讲师、教授等职,1938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主持创办西北农学院蚕桑试验室。姚教授从事农业教育与科研工作,先后辗转9个地方,奔波22个单位,历时50余年。1918年编著了《蚕种论》,1937年和1943年分别著有《蚕学》《养蚕学》和《栽桑学》三部著作。1958年陕西省成立蚕桑研究所,姚教授出任首届所长。

陕西蚕桑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国蚕桑生产的发源地之一,并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一度有所发展,1918年(民国7年)全省产茧量达到1.407万吨,当时居全国第三位。1927年(民国16年)陕西省当局,将三秦公学农科,改为陕西省第一职业学校,设有纺织、农林、蚕桑三科。此后陕西蚕茧生产虽处于下跌趋势,但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地区,仍处于平稳发展势态,而且对繁荣集镇起了重要作用,安康、汉阴、石泉等县城,已相继成为蚕丝交易市场。1924年(民国13年)陕西省政府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当时安康县拥有湖桑、土桑160余公顷(8万余株),年产土丝11.5吨。1931年(民国20年)安康全区产茧607.5吨,占全省产茧量的73.4%,为安康地区产蚕茧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仍未维持陕西蚕茧产量的正常水平,1933年(民国22年)全省产茧量下跌到0.165万吨。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内战不休,民不聊生。不仅极其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而且对工商

业横征暴敛,倍加摧残。加之天灾不断,匪霸横行,交通闭塞,技艺落后,农业、商业、工业遭到极大破坏,蚕业生产随之急剧衰落。解放前,1949年全省桑园866.7公顷,产茧量仅为300吨。重点产区的安康地区仅有桑园733.3公顷,产茧量103.8吨,只占抗战前最高年产茧量的17.9%。<sup>(1)</sup>

解放后,全省的蚕茧生产,在蚕茧市场价格、科学技术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下,30多年来,徘徊在0.5万至1万吨之间,50年代初期由江苏、浙江、四川等省支持陕西调入一大批蚕业科技干部,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以及新蚕品种的普及。从此为陕西的蚕桑生产带来了生机,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由1953年的1600公顷和400吨,增加到1959年的3400公顷和1100吨。1962年,全省桑园面积减少到1666.7公顷,产茧量下跌到450吨,降到了1953年的水平。1963至1964年,蚕桑生产继续下降。经过调整,到1965年蚕桑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同时在五六十年代也先后在安康、清涧、延安、宝鸡、汉中建起了蚕种场和缫丝厂。1966年全省桑园面积达到26.9万亩,蚕茧总产量达到1400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地方把栽桑养蚕视为资本主义倾向,要“挖根刨桑割尾巴”。宝鸡县的桑园面积被砍了2/3。安康地区的桑园面积由1965年的10406.7公顷,下降到8593.3公顷,但产茧量由945吨上升到953.95吨。扶风县大量桑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挖掉。到1975年全省桑园面积减少到9866.7公顷,比1966年减少了8000公顷。但由于当时采用了先进技术和引进了优良蚕种,蚕茧产量仍有所上升,全年产茧量达到2000吨,比1966年增产600吨。

从1980年起,农村养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了大批养蚕专业户,当年全省饲养蚕种12.53万张,产茧量达到2851吨。1981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快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大量栽桑养蚕,全省有蚕桑生产的县达75个,占全省106个县(市)的70.7%。到1982年,全省桑

园面积由 1980 年的 16466.7 公顷,增加到 32733.7 公顷,产茧增加到 4374 吨。1983 年关中的户县、三原部分地方一度出现了限产限购的作法,挫伤了部分农民的养蚕积极性,使部分农民挖桑改种其他作物。尽管如此,但全省 10 个地(市)都有蚕桑生产,年产 5 吨蚕茧以上的县(市)按其产量大小分别是:500 吨以上的有安康、紫阳县,250~500 吨的有石泉、旬阳、汉阴、平利县,50~250 吨的有岚皋、宝鸡、镇安、略阳、户县、三原县,25~50 吨的有子长、西乡、汉中、延川、洋县,5~25 吨的有宁陕、子洲、吴堡、蒲城、清涧、商县等。此后,各地也在不断扩建缫丝厂,先后有石泉、平利、紫阳、三原、千阳、略阳、安康、汉阴县(市)建起了缫丝厂,兴办地方产业,扩大蚕茧生产的附加值。随着蚕桑生产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发展,省农业学校、安康农业学校,开设了蚕桑专业,为全省蚕丝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现在全省拥有年产普种 70 万张的生产规模,满足了全省蚕茧生产的用种。1984 年关中一些县自筹资金,兴建起了 17 处烘茧站,从此开辟了一条农口办茧站的途径,1985 年农口茧站全省增加到 34 处,解决了部分地区农民“卖茧难”的问题。当年全省重点养蚕专业户共有 3.3 万户,桑园面积达到 46733.7 公顷,产茧量达到 4875.3 吨。全年生产 50 吨以上的县增加到 11 个县(市)。在地区分布上,陕南三个地区占全省产茧量的 90%,其中安康地区产茧量占全省近 80%,安康县是全省产茧量最集中的县,1972 年成为全省第一个年产茧 50 吨茧的县,1985 年全县人均 100 株桑,产茧量达到 151 吨,居全省各县(市)产茧之首。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发展,稳住了全省蚕桑生产的阵脚,从 1986 年起,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全省饲养蚕种量 20.4 万张,蚕茧产量达到 5276 吨。尔后,每年都呈直线递增。1991 年,桑园面积恢复到 3866.7 公顷,全年养蚕 38.38 万张,蚕茧产量突破 1 万吨。此后,更加快了发展步伐,1993 年全省桑面积达到 80 万

亩,年养蚕 47.8 万张,产茧量达到 1.4 万吨,经过 75 年的艰辛努力,使全省的年产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参考表 1)。在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鼓舞下,陕西省的茧、丝、绸生产的产业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略阳、千阳县在茧、丝、绸、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方面,为全省茧丝绸行业体制改革积累了点滴经验。陕西省政府把蚕茧生产也列入主导产业发展,蚕茧生产也不例外地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1995 年由于厂丝价格的下跌,全国茧丝绸市场疲软,影响到了陕西省的蚕茧生产,致使 1996 年全省的桑园面积由 1995 年的 76666.7 公顷,下降到 63333.7 公顷,年产茧量由 1.771 万吨,下降到 1.356 万吨。

全国蚕茧生产经过一个暂短的波动,形成了全国性的毁桑、蚕茧减产的局面,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全国蚕茧生产主产区的浙江、江苏、广东等省,表现的更为严重,形成了全国性的原料茧不足,导致大批缫丝企业停产。这种局面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96 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茧丝绸工作会议》,国务院确定的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方案是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在总结多年茧丝绸行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借鉴山东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以主产省为单位,组建贸工农、人财物、产供销一体化集团。<sup>[10]</sup>1997 年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提出改革具体意见,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政企分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加强和完善宏观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按照自愿原则,组建贸工农一体化的茧丝绸集团公司,走实体化的道路;坚持互惠互利原则,以资产为纽带,妥善处理好农、工、商、贸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使农民收入增加,工业良性发展,出口外汇扩大,利税上缴增多,流通渠道畅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茧丝绸